

真相的顯與隱

一論藍博洲二部有關作家和醫生的報導文學

阮桃園*

【提要】

凡事皆有真相，而追求真相乃天經地義之事，然而，過程卻並不單純；有自然變化因素，更有受到人性各種複雜因素所操控，使得真相難以大白。然而，人類探索真相的好奇之心，與鍥而不捨的精神卻因此被激發而生。

台灣社會從一九五〇年代開始，流傳著一批神秘人物；他們生死成謎，家屬及親友長年沉默低調、甚至隱姓埋名，其下一代的社會發展亦大受影響。

約四十年之後的一九八七年三月起，台灣當時唯一的報導文學刊物《人間》雜誌派出記者藍博洲，針對此展開了長期的調查，此後二十年內共完成了三部享譽文壇的報導，本論文就其中近期完成的二部作品：《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2001）、《消失中的台灣醫界良心》（2005），依據歷史學中「民眾口述歷史」的觀點，以及報導文學的特殊散文寫作技巧，交叉析論而得出二點結論——

1. 受到刻意壓抑的真相，終將有大白之日。
2. 哪裡有不公、不義，報導者就該現身哪裡，不分種族、國界、地域。

關鍵字：藍博洲 報導文學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師

一、前言

探索海域的人常發出長嘆：真相永遠埋藏在深處不見天日，需要我們持之以恆的努力探勘，才有真相大白的可能！中國的萬里長城的正確長度之所以成謎，是由於受到長期風沙的掩埋，科學家正嘗試利用衛星透視地層來探測。

自然力之外，經由權利與無知而產生的貪婪、傲慢、偏執、怯懦，也往往會對事實產生了驚人的掩蓋力。世紀病毒 AIDS，曾經在美國被汙名化為「男同性戀者的天譴」，經過醫學界不斷的探究，終於確定感染源其實來自非洲綠猴。議者認為：若非資本主義的貪婪，AIDS 病毒不至於被海地的低廉勞工，從非洲流傳到海地，又若非美國男同性戀者為了逃避歧視，將年會移師海地而遭受感染回國，也許不會引起世人注意 AIDS 的肆虐，從而投注心力進行當代最尖端的醫學探研工程，而 AIDS 仍將繼續在非洲肆虐。❶

政治力對真相的掌控，更是人力當中相當大的一股能量。❷例如四〇年代的台灣，於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起經歷了一場近半個月的社會動亂，從此展開了長達四十多年的「戒嚴期」。這段期間，一直有一批「神秘人物」在民間被流傳著，他們是誰？匪諜？叛亂份子？他們在想些什麼？做了什麼？後來又是如何消失的？一切都是如此諱莫如深。

自一九八七年三月起，藍博洲隨著《人間》雜誌的企劃案，對「二二八事件」相關人物展開了調查工作。一九九一年之後的十五年當中，一共完成了三部頗具份量的系列性報導：《幌馬車之歌》（1991）、《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2001）、《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2005），其中第二、三部所報導的故事，體例較齊整，聯結性強，最重要的是，作品所具備的參考價值與影響力，在台灣的報導文學界，可以說是空前的，於此擇而析論之。盼能藉此論述過程來驗證；儘管壓抑真相的力量永不會消聲匿跡，但是，那企求「真相大白」的努力也恆常不絕如縷，猶如蒼穹與星辰般相互對照。

❶ 見《人間》雜誌第十九期，頁84-87〈AIDS滋生的溫床—駁「天譴同性戀者」說〉。

❷ 見中國時報2005/7/2A4版「名家專論」欄。

二、尋覓與探訪：向迷霧探索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共報導了六位台籍作家：宋非我（1916－1992）、簡國賢（1913－1955）、呂赫若（1919－1951）、雷石榆（1911－1996）、藍明谷（1919－1951）、吳濁流（1900－1976）。《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則是四位畢業自臺北帝國大學（今國立台灣大學）的醫生：郭琇琮（1918－1950）、胡寶珍（1926－）、蘇友鵬（1924－）、許強（1913－1950）。除吳濁流之外，他們具有很高的同質性：青年時期均遇逢日本殖民帝國主義盛行，因為不滿而熱衷鑽研左翼思想，無政府主義（宋非我）。台籍青年又遭受到日人充滿歧視的教育制度對待而極端抗斥皇民化教育，心生嚮往中國民族之情感，簡國賢、藍明谷、郭琇琮等四位台籍醫師等均是。雷石榆，則是廣東籍留日青年，在東京時即活躍於左翼文壇，和楊逵、呂赫若相熟，從廈門受邀赴台辦報，後受許壽裳之聘任教於台大中文系。他們皆屬於其專業領域中的精英人物。^③

這些人物，在藍博洲開始尋訪時的存亡狀況分別是：

簡國賢（處決）、藍明穀（處決）、郭琇琮（處決）、許強（處決）、雷石榆（流放香港）、呂赫若（逃匿期間遭蛇咬身故）其餘存活者；雷石榆定居河北省，作者未曾親訪，主要是透過雷著《我的回憶》來掌握線索了解其人。此外，藍博洲親訪本人的有：宋非我、胡寶珍、蘇友鵬，均是透過入獄時間最久的政治犯林書揚所引介而訪得。其中宋非我在結束受訪後不久重返大陸、香港，藍博洲完稿時接獲他已於一年前逝於泉州養老院的消息。

尋訪到遺族（孀）、故舊同道的有：

（一）簡國賢－遺孀簡劉理

故舊：宋非我（故友、同道）、葉紀東（故友、同道）、石聰金（牢友）、王阿秀（鄉民同情者）、陳克城（故友、受牽連）、郭明哲（牢友）、李石城（牢友）

^③ 根據作者的敘述；例如宋非我、簡國賢是台灣新劇運動的旗手，呂赫若則以音樂、小說創作見稱，雷石榆的詩歌、文藝批評引領風騷，藍明谷的文采也受到公認，而這些敘述，作者寫來，又都是有憑有據，具有公評的。

(二)藍明谷－遺孀張阿冬

親故：李河民（本名蔡川燕，藍明毅從母姓胞弟）、葉崇培（同道，北京受訪）、戴傳李（同道、基隆中學同事）、鍾裏志、鍾國輝、李旺輝（均為同情者，因庇護藍而受累入獄）

(三)郭琇琮－遺孀林雪嬌

親故：郭琇琳（胞弟）、蘇友鵬（北帝大醫學部同學、同道）、潘淵靜（士林協志會同志）

(四)許強－遺孀劉順娣

故舊：張漢其（外甥）、李鎮源（臺北高校、北帝大醫學部同學）、蕭道應（臺北高校、北帝大醫學部同學，同道）、邱林淵（北帝大醫學部同學）、宋瑞樓（北帝大醫學部學弟）

(五)呂赫若－遺孀林雪絨

親故：呂芳雄（次子）、蘇新（舊台共，和呂共編左翼報，對呂應有影響）、巫永福（文友，呂左傾後怕拖累巫即少交往）、陳文彬（曾和呂共組讀書會）江漢津（中學同學）、林寶煙（妻舅，同情者）、蕭坤裕（同道）

戒嚴時期，上述人士因著各種因素，往往是保持緘默、低調的生活態度，甚至隱姓埋名；例如蘇友鵬醫師於一九七二年之後，即在二十四小時均受監控的鐵路醫院行醫，飽受精神壓力，直到一九八〇年才第一次獲准出國。胡寶珍醫師，寫了好長一段時間的生活報告給管區警員，直到戒嚴令解除，才被取消戶籍謄本上的「政治犯」印記，後半生因此淡泊名利，專心服務窮人。也許如傅柯所言：「社會秩序，總是依多數人的標準而定，」因此他在【瘋癲與文明】中寫著：「這種理性就是社會秩序、肉體和道德的約束，群體的無形壓力以及從眾（comformity）的要求…於是，沈默成了少數一方的理性獨白」。^④ 尋覓線索的過程，往往是耐力、熱忱、敏銳度的綜合考驗。1987年，花了近六年時間，追蹤拍攝 AIDS 病患，因而獲得「世界新聞攝影比賽」首獎的 Alon Reininger 說，因為認識到愛滋病的嚴重性，一定要有人加以報導的這份信念，他才能一直堅持下去。他表示，

④ 《瘋癲與文明》，前言。

克服採訪工作的重重阻礙就是要堅持到底。^⑤

藍博洲著手「二二八」事件的田調工作，正能體現 Alon Reininger 的上述精神，因為那是尚未解嚴的 1984 年，仍然充滿著政治禁忌，又遭到退稿的挫折，卻仍嘗試循線逐一摸索；本來希望從一位「台灣牢齡最高的林書揚」那兒，尋找一個叫「吳德裕」的人，結果沒找著，卻因此而知道了郭琇琮這位人物，「立刻抓住了我那原先在歷史的迷霧中失去方向感而感到受挫的心」（《迷霧》頁 15）。但同時，郭琇琮的遺孀卻是生死成謎：

有人說，他的妻子當時也與他一同被槍斃了；可也有人說，她並沒有死，坐了十年牢才出獄，聽說不在台灣了…（《迷霧》頁 15）

一個星期後林書揚就為藍博洲查出了真相；林雪嬌其實在台灣過了四十年隱姓埋名的日子！林書揚立即為他安排了訪問的機會。尋訪者獲得關鍵人物的引薦，取得長期刻意維持沈默者的信任，因而採訪得珍貴資料，完成有價值的報導——〈郭琇琮醫師〉，是一篇歷久彌新、啓人無限的作品。

而尋找宋非我的過程更是戲劇化；藍博洲從和林雪嬌的訪談中判斷負責台語廣播的宋非我，應是「二二八事件」中一位頗關鍵的人物，而他又是另一位在事變之後四十餘年來下落不明的人！尋找的過程尚且還被記憶錯誤的耆老葉石濤先生誤導。四年多之後，一九八八年二月，農曆年前的一場婚宴上，他突然遇見了措手不及的狀況：「上菜前，林書揚先生找到我『你不是在尋找一個叫宋非我的人嗎？…快跟我來他人剛好在台灣，而且就在現場。』」然而正式的訪談卻又得等到八個月之後（《迷霧》頁 16，23，25）。至於宋非我本人也是遲至此時，即事件發生三十餘年之後，才知悉他的劇場好夥伴一簡國賢，已於白色恐怖中犧牲…。本是志同道合的一群夥伴，經歷台灣那場五〇年代的政治風暴之後，彼此不通音問長達數十年，陳映真先生稱之為「噤啞」，傅柯名之「沈默」（silence），經由這一場尋訪歷程，得以重新串聯的人物就有不少^⑥，藍博洲可說是在從事一場「沈默的考古學」（《瘋癲》，前言）。他必需盡量把「說故事」（口述歷史）的人物找齊。

^⑤ 《人間》雜誌第十九期，頁 76〈他的攝影撼動了西方醫學界〉。

^⑥ 郭琇琮遺孀林雪嬌、簡國賢遺孀簡劉理、王昶雄（日據時期作家）見《歷史迷霧》頁 17、27、63。

三、「時空」重建的藝術工程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應是口述歷史與傳記文學的結合體。

關於口述歷史，有幾個概念可供參考：

(一)沒有哪一個團體對於過去的瞭解是獨一無二的，好的口述計劃是必需廣為張羅，蒐集各種相關資料，儘可能地記載參與事件的各類人物或是社群成員。

(二)沒有任何一項資料是絕對可以信賴的，任何資料都需要用其他證據加以比對。

(三)訪談工作通常是在事情發生過後若干年才進行的…由訓練有素的訪談者來進行，他既能提問題，又能挑剔含糊的答案。^⑦而既然要表現出文學屬性就必需：「有藝術性，即要塑造有審美價值的人物形象，有吸引人的情節，有可讀性的語言等。…在保持人物與事件真實性前提下，應有適當的藝術加工。藝術加工離不開想像，黑格爾說：最傑出的藝術本領就是想像。」^⑧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重新建構當時的狀況，而對待受訪者的倫理則是：為了避免重蹈歷史的覆轍。^⑨

「戒嚴」時期的台灣社會，有個集體的困惑：匪諜，叛亂者，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呢？他們在想些什麼？又做了什麼？

在二〇〇五年完成的《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寫作技巧日顯純熟的藍博洲，為四位人物均安排了一段「提筆」文字：郭琇琮醫師是「我要讓鮮血流在潔白的襯衣上…把我的屍身用火燒了，將骨灰撒在我所熱愛的這片土地上，也許可以對人們種空心菜有些幫助呢！（臨刑前遺妻書）」；蘇友鵬醫師是「他們沒走完的路我們一定要繼續。」，胡寶珍醫師：「我對貧窮的聲音特別敏感！」，許強醫師是「法官說，『這個人，國家不能讓他活下去了』」。這將使讀者在心中貫串起一個很深的疑問：他們，都是社會各領域的精英翹楚，又對人群充滿熱愛，理應可讓社稷充滿期待，卻無法見容於當權者，二者之間的矛盾何以如此激烈？

^⑦ 見《大家來作口述歷史》，頁四四，王芝芝譯，臺北，遠流，民86。

^⑧ 見《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頁4-5，陳蘭村主編，北京，語文出版社，1999，1月。

^⑨ 見同註7，頁三八。

在〈郭琇琮醫師〉文中，已提到他在日據時期，就因為和蔡忠恕「發展漢民族意識的反日學生組織」，而被嚴密監控後遭到逮捕，加諸嚴重刑求成傷，一出獄就入院醫治被刑求而打斷化膿的肋骨（《醫界良心》頁 31，38）。此外，得到日籍醫學者澤田藤一高度肯定為，可能是亞洲第一位得到諾貝爾醫學獎的腸胃科醫師許強，被軍事法庭判定：「國家不能讓他活下去了！」後，蘇友鵬表示：「優秀的人才是非常難得的！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殖民地台灣才出現幾個向許強老師，郭琇琮和吳思漢等那麼優秀的人才；可是光復才五年，一場白色恐怖的政治風暴就輕易的把他們撲殺了。」而審判的程式又是如此的不公正，令人深感不服：「被判刑時，不但沒有人旁聽，也沒有律師；既沒有申訴，也沒有對質；更沒有什麼上訴的機會。…其實，在被捕的當時，他們就已決定該怎麼判這些被捕者的刑了；所以根本不需要什麼審判的程序。」（《醫界良心》頁 132，133，168）我們已可隱約感受到，知識份子的理想、思想、作為，自來都是和統治者維護權勢的立場，有基本的對立性存在的。而透過他們的行傳，更加令人感慨，文明發展到了二十世紀，此種對立竟然仍必需以迫害鎮壓的手段解決。

而行為得以無畏的堅持下去，往往是有一套思想作為支柱力量的。

（一）思想脈絡—他們在想些什麼？

這一部分的敘述，可說是這二部「消失」系列作品中的骨幹，是藍博洲用功勤、著墨深的主力文字。

合而觀之，作家和醫生，都是出生於日治期間，或出於家庭背景，或由於教育過程，對於日本政府歧視教育政策，帝國的侵略野心感到十分反感，而產生了堅定的「反封建」、「反皇民化」思想。但仍是有一些差異的；像宋非我便是受到台灣文化戲劇團張維賢的薰陶，而萌生了無政府主義思想。而張又是受到「祖國文明戲運動」和「日本明治開化期」的劇運雙重影響，而體驗到用戲劇來對民眾宣導無政府主義的良好效果。（《歷史迷霧》頁 29，33，34）劇作家簡國賢、郭琇琮則是「三民主義」、「新民主主義」的信仰者，也是三〇年代作家：魯迅、巴金、老舍、茅盾作品的熱愛者（《歷史迷霧》頁 77，《醫界良心》頁 27，123）。雷石榆，非台籍青年，從廣東到日本留學時，就已是左翼馬克思信徒。呂赫若則於光復後才經由對三民主義的信仰受蘇新影響而左傾。

他們的思想背景除了非台籍的雷石榆之外，都是因為不服日本的歧視台人，轉而心懷祖國，希望有個強大的祖國作為精神憑依。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前後，對時局感到徹底的失望，才轉向寄望於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這一部分，藍博洲對於雷石榆那帶有浪漫思唯的左翼文藝思想，及豐富的文采在「關於詩的創作問題」、「為酒樓女侍應生爭生存權」（《迷霧》頁 163~165，168~170）二節文字中，做了詳細的描述。而〈郭琇琮醫師〉，藍博洲則利用幾段他和別人的對話，將他的內心世界做了令人動容的烘托。

對日本憲兵：

百思不得其解的問他：「像你這種在台灣社會受惠的菁英份子何以還會走上抗日之途？」郭琇琮毫不猶豫的告訴日本人：「身為一個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中國人，儘管個人的生活比別的台灣人安定，家境富裕；但這種個人與日本人的『平等』，不過是在不平等的制度下被同化的恥辱罷了。」

對妻子：

「時局這麼壞，你怎麼會信三民主義呢？」「我很贊成三民主義的兩種主張，」
「第一是聯合弱小民族抵抗強權和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我們台灣人就是沒有民族主義的觀念…第二是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只有把整個不公平的社會制度改造，大家才可以過上幸福的日子。」

對父親：

爸爸，醫生有三種。第一種是只給人治病的醫生；第二種醫生不但治病，並且還找出病因；第三種是像孫中山那樣的醫生，…是救國的醫生…我就是要努力去完成這第三種醫生的典型。（《醫界良心》頁 33，37，57）

至於台籍青年在思想上從反抗日本，心懷祖國的民族主義，到對祖國開始失望，轉向期待中國共產黨，這段曲折的心路歷程，藍博洲選擇在〈從福馬林池撈起來的詩人藍明谷〉一文中，以從台灣高雄岡山的藍家兄弟的青少年生活場景，到光復後的北平，旅平同鄉會，藉著和鍾理和的對話，把台籍青年在大陸抗日群情激憤的氛圍下，感受到的尷尬、苦悶，用「五、勝利了」、「六、台灣省旅平同鄉會」、「七、風光依舊在」、「八、白薯的悲哀」、「九、搖身一變的時代與人們」、「十、中國往何處去？」、「十一、蔡

川燕等人奔向解放區」(《迷霧》頁 254~286)，寫得力透紙背，發人深思，試舉文例：

「看來，」鍾理和…說：「漢奸的定義也是有各種各樣的。」

「搖身一變的時代與搖身一變的人們，什麼都是搖身一變，都在搖身一變，只差變得像與不像而已，…」鍾理和再次感嘆地說。(《迷霧》頁 262, 273)

許強，比較不一樣，家貧但聰明伶俐的他，不但受到日籍教師的惜才而慨然資助教育費用。上台北帝大醫學院時，也備受日籍教授的賞識。科學家的素養使得他反封建、反迷信，反對天皇的神話，排除狹隘的民族意識，但是並未加入「士林協志會」或蔡忠恕、郭琇琮的反日團體，而是參加了「不定期會」，一個和謝雪紅有密切關係的進步組織。

爲社會弱勢者：勞工、農民、婦女、貧病者向強者爭取公正、平等的待遇，就是左翼社會思想的主脈，而奉孫文的《三民主義》爲精神典範。

(二)他們在做些什麼？

每一位「傳主」，藍博洲都在作品的篇名，就已爲他們標示出各自的專業領域；〈尋找台灣新劇運動的旗手宋非我〉、〈尋找劇作家簡國賢〉，宋簡二人於光復後組了「聖烽演劇研究會」，演出《土地公漫遊記》、《壁》、《羅漢赴會》等三齣諷刺國民政府貪污顛預，物價上漲，民不聊生的社會現象，十分轟動，因此受到當局注意，二二八事件發生，宋入獄半年，後心灰意冷轉赴福建廣播電臺，製作對台放送的節目，很受歡迎。

簡國賢在事變之後轉入地下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內文中的「地下黨重建」一節，將一直予人高度神秘感¹⁰的「中國共產黨」重建策略，工作檢討，工作方針，作了明晰的報告，例如：

二、運用勞動方式創立基地：在勞動中求生存、求生活、求安全、求工作，在勞動中團結群眾，教育群眾，爭取群眾的同情；並且利用行政力量薄弱的山鄉地區，建立據點，創立基地，努力「跳圈子」。(《迷霧》頁 90~91)

所有這些因爲當初和「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有直接、間接關係的人物當中，

¹⁰ 見陳映真在其報導之作〈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中「我們的群眾真好」一節，載於《鈴鐺花》人間出版社，1995。

被藍博洲刻劃得最富行動力，理想浪漫性格，堅定不移的，當屬郭琇琮醫師了。

在作品中「士林協志會」一節，描寫這樣的一個場景：「較具有抗日思想的人，又在郭琇琮手寫的國父遺囑上蓋印，結拜兄弟，...並組讀書會，一起研讀《孫文學說》」（頁 27）。還記述他和何斌、陳泗治牧師，把士林協志會經營得有聲有色；舉辦轟動一時的醫學展，頻繁的音樂活動，「『日據末期，在協志會唱歌的那些日子，現在想起來仍然是充滿溫暖啊！』多年以後，蘇友鵬提起年輕時候的唱歌歲月，仍然充滿懷念（頁 30）然而這些都只是爲了轉移日本當局注意力的障眼法，實質上是在發揮反皇民化的作用。

到了光復初期，這個「士林協志會」則在防疫工作方面對於公共衛生又作了很大的貢獻，在「防疫面顯露的社會真相」、「學生的崇高身影」二節，藍博洲筆下那郭醫師的言行舉止，是如此溫熱而令人動容。也是在二二八之後，他作了要反抗國民黨的決定。林雪嬌口述，聯絡郭加入中共地下黨的是個癡瘋病人，日據時期的老台共廖瑞發，此時爲「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書記」。他用一盒內裝滿鈔票的蛋糕成功的試探並吸收了郭琇琮的加入（頁 60，「苦悶與再起」）。他對戲劇的才份與熱誠在「改良歌仔戲」一節中表露無遺，經改良後的《白蛇傳》，於中山堂演出時，吸引了極大的注目：「這其實是地下黨在幕後搞的文化工作呢。」（頁 65~72）藍博洲研判；《台灣電影戲劇史》所記載《白蛇傳》編導者周樹人，很可能就是郭琇琮的化名。臨刑前，他向難友劉明表示希望借一件潔白的襯衣，讓鮮血流在上面！這一言行記述，當可使人想見其人的理想型性格。

另一位在藍博洲筆下表現得十分精采的人物是〈放逐詩人雷石榆〉。文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報導這位來自大陸的青年詩人，在日本東京和台灣文藝青年往來熟絡，在日文刊物《台灣文藝》上發表了豐富的文學評論，展現了左翼的文學觀點：

在猛進著的歷史輪下顛簸、呻吟、殘喘地呼吸著的布爾喬亞的小說家和詩人們，早已喪失了資本主義初期的活生生的魄力，詩是藝術的起源，而藝術又是通過勞動力而產生的。

詩人要...如日本左翼文學評論家森山啟《藝術上的現實主義及唯物論哲學》所說的；在主題上，以「壓縮於我們的階級經驗的斷片中的力」及「生活上的情緒」，直接地表現在我們對最敏感的政治的、時事的問題面所引起的反應。

創作的修養是必要的。那就是：怎樣鍛鍊表現藝術、加強認識力、充實想像力、處理題材、研銳感覺、和展開選擇了的主題，…具體的做法有：「不斷的創作的實習，熟讀、檢考新興藝術論和普羅夫的創作方法論」（《迷霧》頁161，163，164〈我所切望的詩歌〉，〈詩的創作問題〉）

由於和台灣文壇的淵源，他便受邀來到高雄擔任《國聲報》的主筆兼副刊主編，寫了篇長篇隨筆《舞場內外風景線》，犀利批評發勝利財的國民黨人物，及當街調戲婦女的美國士兵醜陋面貌。指出：「在民族解放運動的文化鬥爭中，詩歌是警鐘、是喇叭、是戰鼓、是戰鬥機、是機關槍。」（頁167）讓他備受矚目的二件事是因為廢公娼的行政命令，引發女招待失業的恐慌，導致一位酒家女跳河自殺的社會事件，使他為這些「島上的女兒們」連發了二、三篇社論，聲援她們的請願抗爭，造成取締令暫緩的成果。後受許壽裳聘到台大中文系任教。其後許壽裳遭人（據稱是小偷）暗殺。而雷圍繞著「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浪漫主義」、「革命浪漫主義」等左翼思潮的創作問題闡述，也引起了當局的注意。雖然感到時局緊張，但他一面警覺，一面仍在《新生報》副刊「橋」繼續發表五篇長篇論戰，「鼓勵台灣作家奮勇前進」。這些才氣橫溢又富於理想的性格，為他贏得了著名舞蹈家蔡瑞月的芳心，卻也為家人帶來了陰影；雷石榆於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被捕，後勒令離境。這段期間，他本人飽受煎熬，蔡瑞月攜幼子奔走，原本辛苦辦巡迴舞展籌措旅費，希望全家赴港發展新生活的計劃，最後當局卻只准雷離境，遂令一家人從此咫尺天涯，蔡瑞月還因此入獄三年。四十年後，一家三口才在河北重聚。再過六年，雷石榆過世。

藉著這些亂世中的理想主義者兼行動者的故事，作者給了我們一個清楚的時空座標圖；在那大戰後的台灣，社會擾擾，而這些才俊之士，運用他們的才幹，有效的發揮安定人心，維護公共衛生，免於傳染病大流行的威脅，對於穩定社會秩序，居功闕偉。如此忠於家國的赤忱，竟然遭此厄逆，甚且禍及家屬；許強的兒子許達夫，日後學醫完成要實習時，竟仍遭逢被軍總醫院拒絕接受的景況，讀之實無法不令人長思：孰令致之？

（三）理性的文學—臨時的歷史

真相的追查，本身就是一個理性探索的過程。①

① 見《20世紀中國報告文學理論批評史》丁曉原 安徽大學出版社 1999，12月，頁83。

在作品中，讀者對於作者致力於表現；文中人物故事均具備了「十足的可驗證性」所作的努力，可說是有目共睹，除了提供許多有珍貴歷史價值的照片（註：由於只提供翻拍，可推知照片持有者的珍惜度。），該交付的資料來源，均未見有所疏漏。甚至於還不惜破壞了文藝的完整性，而往往在作品之後加上長列的注釋；承擔了可能引起：「究竟是文學創作還是研究報告？」的質疑的壓力，爲了忠實於「理性推論」的原則，犧牲了體例上的整體美，卻可增強說服力。

推論過程中，另一個重要的環節是「考證」，例如即使親如雷石榆夫妻，雷的回憶錄和蔡瑞月的口述不符合，藍博洲也提出，供讀者判讀。（作家身影，頁 212）。郭琇琮的出身部分，也有二種說法：一是林雪嬌說：「郭琇琮家是舉人出身」，一是與郭同時代兼同鄉又是史學家的曹永和稱：「何家、曹家、潘家，都是士林大家族，郭家是郭坤木一代才興旺起來，不是很大家族。」（《醫界》頁 15）二者都應該是很有可信度，但也各有立場，最好也「呈堂」供讀者自行決定取捨。而關於藍明谷「加入組織」的複雜經過，作者更是將官方的紀錄和他所細細尋訪的個別見證人所提供作一整理之後，一起呈現，供讀者自行參照比對（《迷霧》，頁 291~293）。而對於醫師許強的部分，則由於醫學的專業性強，許強又早逝，作者選擇的表現方式便爲，羅列了對傳主許強前後期東京帝大醫學院的同學中，如今於醫學界均甚具聲望者：邱林淵、李鎮源、宋瑞樓、顏世鴻、蘇有鵬、翁廷詮的訪談摘要，如此也就符合了「提供相關人士的口述以供比對」的口述歷史寫作原則。

這一「時空重建工程」，好似一場「拼圖遊戲」，要仔細蒐集、比對，才能將縫隙逐一填補。那麼，是否將質勝於文而損傷了文藝之美？作者似乎知所補償，茲論述如下。

（四）經營「懸疑張力」—最具吸引力的情節

很少有人不會著迷於那所謂「正反」二股力量之間的角力戰的：反對者與被反對者，強勢者對弱勢者，鬥力與鬥智，不論是小說或戲劇，歷史或現場，虛構或寫實，都足以構成最勾懾心魄的焦點情節，報導文學，依賴的是作者裁剪事實的功力。

國共之間的角力戰，戰場在台灣和在大陸不太一樣，除了強弱勢懸殊，最主要的追逐戰是在那形勢險阻的山區展開。當二二八事件發生之

後，所有的組織便「地下化」。〈尋找劇作家簡國賢〉中，記載「地下黨重建」的工作有這樣的內容：「四、從鄉村到山上：加倍吃苦，禁止坐火車、坐汽車、走大路，必須走小路、走山路、走夜路。反對太平觀念，時時提高警覺，要住山寮、住山洞、住溪邊、住荒地、住叢林等。」（《迷霧》頁 91）。而「第九幕：流亡大安溪」一節，有石聰金的口述逃亡歷程，甚為緊張扣人心：

由於大安溪上、中游一帶有著複雜的山脈、多曲的支流，以及綿密的保安山林，…此外，這一帶的農村，副業發達，農民大都種植香茅，並從事燒炭的生產，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於是我們就決定溯溪而上，展開我們在大安溪流域的流亡生涯。…我想他（簡國賢）是一個生性浪漫的藝術家吧！記得，當他第一次看到炭窯裡燒得鮮紅的炭火時，即使是在緊張的流亡生涯裡，他也忍不住大聲讚嘆道：「好美的火光啊！」（《迷霧》頁 91、92）

郭琇琮夫妻在宜蘭的地下生涯，也是令人緊扣心弦的：

在那裡，郭琇琮主要搞工人的組織工作。據我了解，我們在南方澳有個游擊基地。不過，武器並不是很多；…有一次，郭琇琮要我幫忙把步槍上的刺刀片裝在甘蔗裡頭，送出去。可是我的皮膚白白的啊！怎麼看也不像鄉下婦人；郭琇琮於是要我特別化妝，然後帶上斗笠，再將頭上的包巾遮到嘴巴那裡，打扮成鄉下女人的模樣。（《醫界良心》頁 77）

充滿肅殺的文藝之美，沒有人希望這一切發生，卻也無人能阻止其發生，最主要是那總恆常存在的理想主義者，以那永不磨滅的浪漫精神，來對抗同樣恆常存在人性中的薰心利欲，在〈郭琇琮醫師〉一文中報導這一段郭家父子的對話，最能顯現這一股糾葛：

「我怎麼也搞不懂，…我們家有錢、有地位，活得好好的！怎麼就會生出你這個老是反政府的兒子？」…郭琇琮理直氣壯的批評郭坤木：「但是，您卻保守、馴服，只顧慮到自己身家的安危與榮華富貴，卻全然看不到人民被強權欺壓的痛苦！」（《消失》，頁 54）

然而，最最具備「張力感」的懸疑是：出賣！根據親友各種合理的推斷，都認為郭琇琮被捕，是被他素所崇敬的蔡孝乾出賣的：

關於蔡孝乾被捕以後又「脫逃」的過程，在許多當年的政治受難者之間，一直流傳著「捉放曹」的說法。但是，如果國民黨情志特務的兩種說法都可信的話，那麼，關於蔡孝乾「捉放曹」的傳言就只是一種不能確定的風聲而已。但是，我們，或者是蔡孝乾本人，又要如何解釋自他被捕以後的大量逮捕呢。事情的真相如何，在蔡孝乾已死而且沒有留下歷史紀錄的情況下，我們實在很難作出定論。然而，就算蔡孝乾到今天還活在人世的話，我們又如何能夠期待一個「投降」的地下黨的領導人會對當時的情形說些什麼呢？事實是，無論他怎麼說都沒有人會相信他所說的話了吧！

另外，根據同樣因案被捕的胡鑫麟醫師口述：

聽說蔡孝乾第一次被捕後，跑出來，四處風聲說他曾被捕，郭琇琮問他，你不是被捕了嗎？他連聲否認說，沒有，沒有。蔡孝乾第二次被捕時，郭琇琮也一併被捕了。（《醫界良心》頁 79~80）

事實真相之所以會如此的撲朔迷離，除了出賣者的資料受到嚴密保管，以便確保後續仍可源源不絕的出現出賣者。此外，報導者謹守「讓證據呈現真相」的分際，審慎推論，不急躁於作出聳動的敘述，也是主要因素。

不過藍博洲日後仍依據這一：「是誰在賣友求榮？」的懸疑，鋪寫而成小說《藤纏樹》。

（五）革命型的婦女圖像顯影

如果說，要塑造有審美價值的人物形象，是良好的史傳文學要件之一，那麼，藍博洲這一系列作品中，對於傳主背後的一些婦女形象刻劃，最是令人印象深刻了。蔡瑞月，當時已是小有名氣的舞蹈教學者，得到詩人兼報社主筆雷石榆的策劃，辦了次「場場爆滿」的舞展，「這次的演出也促成了我和雷石榆的感情。…他有詩人純真高雅的氣質。」是她向採訪者所口述。但是，日後雷因為受到軍統局的注意，間接造成了被台大解聘的結果，從此生活所需，便倚賴蔡瑞月在家中開設舞蹈研究所為主要來源。接著舉辦的一次巡迴舞展，就是為籌措他們一家三口，避離日益緊張的台灣到香港求發展的旅費了。沒想到慢了一步，雷就被拘押起來，直到一個月後被判單獨驅離出境！期間飽受曲折奔波的蔡瑞月離別前的叮嚀

依然堅強：「好好保重身體，只要健康的活著，總有一天會見面的。」（《迷霧》頁 173，202，209，219，220）。而郭琇琮的祖母，依據〈郭琇琳證言〉，我們見識到一百多年前的一位台灣婦女的不凡器度：

「辜顯榮實在很能幹！」郭坤木欣羨的說：「不但見過天皇，現在還做到貴族院議員呢。」「人，地位高，不一定是能人啦！」母親聽了沒多說什麼，只是冷冷的這樣回了一句。「你在說什麼？」郭坤木感到很訝異地說…「像他那種取大某細姨的人，到底哪裡能幹？」母親與帶諷刺說：「又不是不曾看過人好額？」（《迷霧》頁 20）

有這樣的祖母，難怪郭日後會理直氣壯的頂撞父親：「我們郭家，本來就具有反抗惡政的優良家風。」（《迷霧》頁 54）。林雪嬌，出身仕紳家庭，受過良好教育，深具婦女平等觀念的的大家閨秀，在丈夫身故後四十年接受藍博洲訪問時，居然還可讓他感受得到，她當年初識郭琇琮時的那份愛慕之心。郭的家世、學歷或許本就具備吸引女性的條件，但是真正使她芳心大動的是，在那光復初期，戰亂之後公共衛生條件惡劣的台灣，飽受天花、霍亂、鼠疫傳染病肆虐的威脅，郭琇琮醫師率領一批人日夜奮戰，甚至親見他細心不避惡臭的在藝姐兼地下室，治療感染了梅毒的女孩。「我看到郭琇琮那種家庭出身的人，卻能放下身段，為勞苦大眾服務；也因為欽佩郭琇琮人道主義的人格和觀念，於是也開始試著從生活上自我改造。」（《迷霧》頁 51）。最令人動容的是她答應求婚的條件居然是：「嫁給我的人，生活會很苦，以後要過喝稀飯配蘿蔔乾的苦日子，你願意嗎？」。婚後的林雪嬌：「記得，剛嫁到郭家的時候，我母親擔心我不能適應大家庭的生活，於是讓一個丫環陪嫁。可是他卻語帶諷刺的勸我，封建時代的小姐才要奴婢伺候，你有手有腳，帶個丫環過來要幹什麼？我們應該讓她回家去嫁人。第二天，我就讓她回去了。」（《迷霧》頁 64）郭琇琮的岳母，在那慌亂歲月，也有豪氣干雲的言行表現：

我母親隨手拿了一些錢和金戒指給我，要我跟郭琇琮馬上逃走。…我放心不下孩子。…我母親堅決的說！『你丈夫既然敢作，你做查某人的，就要勇敢承擔！人家謝雪紅都敢作，你怎麼不敢作？囡仔妳給我放著，我會給妳餉，妳緊走！』（《迷霧》頁 75）。

另外一個群像，是對丈夫的言行或一知半解，或全然不知的，只是負責理

家，讓丈夫完全無後顧之憂的做自己的事，其中較幸運的是劉順娣，因為她具備助產士資格，有很寬裕的經濟能力，在丈夫許強被處決過世後，獨立撫養五個子女成人，並且都受了良好教育，但是她從此不准孩子們涉足政界。她們受到丈夫政治社會理想的牽累，身心俱付出沉重代價則無一倖免；林雪嬌坐了三年的牢，簡劉理幾乎得憂鬱症：「因為這些人的不定期騷擾與威嚇，我整個人也陷入心驚膽顫的狀態，…長久下來，我整天都處於失神的情境，端茶喝水時不是拿不穩茶杯而摔落地面，即是把水倒到杯外，上個廁所後就怎麼也站不起來；煮飯就燒焦，…」(《迷霧》頁 100)。

然而，她們無怨無悔的堅定支持，適足以烘托出：造成她們所熱愛、支持的人「消失」的那股力量是如此的不正不義，如此的悖謬，遺憾後世後代。

四、深思：台灣的左眼何時再開？

長期以來的台灣，凡屬於左翼的經典之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資本論》、及三〇年代中國左翼作家如魯迅、巴金、老舍、茅盾等的經典文學作品全部遭禁，而任憑當權者按照己意將之簡化的詮釋為「思想的毒素」，又逢上列寧、史達林假借馬克思之名，而行一黨之獨裁，整肅異己的恐怖統治，¹³而中國共產黨又和俄共相呼應，左翼精神，從此被扭曲成「恐怖統治」的同意詞，左翼的信仰者也因為曾經受到的大量、而且持續很長時間的迫害，寒蟬效應所致，真相一直無法得到真正的釐清。例如另一位亦遭監控的旅日經濟學者劉進慶即曾慨歎：「戒嚴…許許多多的政治禁忌擋在研究者的面前。…研究活動日漸萎縮，自然不能期盼學問的進步與研究成果的出現。」「事實證明，台灣經濟的實際走向，…已經不是國民黨之所謂『民生主義』的實行，而是名副其實的資本主義的發展，至為明白。」¹⁴

其實真正的左翼精神，在台灣本土作家楊達小說《送報伙》、《鵝媽媽出嫁》中，得以一窺端倪。此外，左翼的核心思想：尚智、寡欲、悲憫情

¹³ 見《文明是怎樣造成的》湯恩比著，于文改寫 頁 114~115 水牛出版社 民 81。

¹⁴ 見《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序言頁 2, 7 劉進慶著 台北 人間出版社 2001, 3 月。

懷，¹⁵就是富有改革社會的理想主義型知識分子對自我的期許，企求解放被帝國主義的貪婪所奴役的社會底層，為之爭取平等、民主的待遇：「工人政黨不應該成為某一個資產階級政黨的尾巴，而應該成為一個獨立的政黨，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黨綱…以便得到近一步爭取本階級利益的空間。」。¹⁶總之，當年那群社會精英分子；因為台灣政權一再轉換，不斷對社會的改革期望落空，轉而成為富含馬克思社會改革理想色彩的《三民主義》信徒，卻不慎成為政權爭奪下的犧牲品，如果當權者能夠賦予他們憲法所保障的「辯論權」，讓彼輩獲得為理念辯解明析的空間，台灣的社會應能因此得到更豐富的精神文明吧？因為當年台灣左傾的共產黨員中畢竟是充滿了知識分子，¹⁷而這些富含社會改革理念的知識分子，在先進開明的社會如日本，思考的自由是受到保障的，從蘇友鵬醫師、胡寶珍醫師的口述可獲證實。

作者藍博洲，歷經長期鏗而不捨的努力，完成的田野尋訪，蒐集相關檔案資料、圖片加以旁證，使得當年從日據時期，沿著日本、中國大陸發展下來的台灣左翼、老台共、台共，其思想與行動，嘗試著突破當時尚在戒嚴的政治禁忌，為我們所作的脈絡扒梳、報導，使得當時為此一社會價值奮鬥、犧牲的群英，得以重新被我們所認知、景仰。更使得一向只有資本主義、右翼思想的台灣社會，多了一個比對的憑藉，《人間》雜誌雖然在八〇年代維持了四年即告停刊。但是左翼文學健將陳映真先生¹⁸所言：「社會如同個人，要同時具備左眼與右眼，才能看得均衡。」則屬闢見無疑。

當今，強勢的權力試圖干預不公不義真相的揭發，依舊是所有社會的共有現象。¹⁹然而，事實的發展依然堅實的證明：「教科書和濫權的政府一樣，會使某些人消失蹤影，但只是一時的。因為像公共紀錄、私人信函、口述史料之類的材料，即便過去曾被隱瞞壓抑，卻苟存著，留待激起另一時代探討者的好奇心。」²⁰藍博洲的著作，為這作了真知灼見的詮釋。

¹⁵ 此為三〇年代知名報告文學作家蕭乾所歸納，見所著《我要採訪人生》「後記」。

¹⁶ 見《批判與再造》二十九期，〈馬克思和恩格斯—未被頌揚的締造民主飛躍的英雄〉頁9。

¹⁷ 見《台灣社會運動史》v.3 第二節 台灣共產黨 台北 創造出版社 1989。

¹⁸ 陳先生著作系列的反帝國主義色彩濃厚的小說，享譽華人文壇，並因左傾而被判刑十五年，八年後始獲特赦出獄，八〇年代創為社會弱勢發聲的《人間》雜誌，經濟問題停刊後十五年，復成立「人間學社」，繼續領軍，從事相關報導，史料編輯等工作，貫徹如一的精神，堪為社會典範。

¹⁹ 見《有權無責—英國的報紙與廣電媒體》德 Curran James /Seaton Jean 合著 魏瑄、劉昌譯。

²⁰ 見《歷史的真相》頁 274~275，台北，正中，民 85。

而哪裡有不公不義，報導者就該現身哪裡，不分種族、國界、地域。追查悲劇發生的真相其意義在於：「經過反省，才能看到自己。」（尼采，《悲劇的誕生》）

主要參考書目

1.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 藍博洲 臺北 聯合文學 2001，8月。
2. 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 藍博洲 臺北 印刻文學 2005。
3. 中國當代散文報告文學發展史 余樹森、陳旭光合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6，8。
4. 大家來做口述歷史 Donald A.Ritchie 著 王芝芝譯 臺北 遠流 1997，3月。
5. 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 陳蘭村主編 北京 語文出版社 1999，1月。
6. 瘋癲與文明 傅柯 劉北成、楊遠嬰譯 臺北 桂冠 2002，6月。
7. 台灣社會運動史 v.3，v.5，王乃信等譯，臺北 創造出版社 1989。
8. 歷史的真相 Joyce Appleby，Lynn Hunt，Margaret Jacop 合著薛絢譯 臺北 正中書局 民八十五。

Silence and Revelation: On two volumes of reportage on writers and doctors by Lan Bo-Zhou

Yuan Tao-yuan*

【 Abstract 】

There is a truth to everything, and the pursuit of it is an intrinsic desire. Yet the process is not simple: Changes by natural causes and still more the sophisticated human factors may compromise the pursuit. Nevertheless, the curiosity for truth and the persistence is inexorable and thus aroused.

Starting from the 1950s, mysteries began circulating in the Taiwanese society about a group of people whom nobody knows if they were dead or alive. Their friends and relatives lead very low profile, silent lives and even hid their names. Their children's advancement in the society is also affected.

Forty years later, beginning from March, 1986, "Ren Jian," the only periodical of reportage in Taiwan of that time, sent reporter Lan Bo-Zhou to launch a long-term investigation on this matter. In the next twenty years he completed three renowned volumes of reportages.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two latest volumes: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2001)、"消失中的台灣醫界良心"(2005). Through an analysis from the aspect of oral history and the special prose technique in reportage, this essay concludes as follows: 1. Oppressed truth will one day be revealed. 2. Wherever there is injustice, there the reporter should be, whatever the race, boundary and nation.

Keywords: Lan Bozhou Reportage

* Instruct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